

新二十六期

二〇〇九年五月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京研究院

燕京學報

新二十六期

主 編： 侯仁之

副 主 編： 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丁磐石 王伊同 * 吳小如 侯仁之

* 夏自強 * 郭務本 * 徐蘋芳 張瑋瑛

張廣達 * 程毅中 * 經君健 * 劉文蘭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 郭務本

編 輯： 江 麗 李月修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五月·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新26期/侯仁之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5

ISBN 978-7-301-15060-3

I. 燕… II. 侯… III. 漢學—中國—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53632 號

書 名: 燕京學報 新二十六期

著作責任者: 燕京研究院 編

責任編輯: 王春茂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5060-3/K · 058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編輯部 6275203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20.75 印張 326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9.5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本學報出版承美國哈佛燕京學
社資助。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Journal has been financially
assist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目 錄

從多元出現核心	許倬雲(1)
從居延到黑城(亦集乃) ——中國西部開發中的歷史經驗一瞥	徐蘋芳(15)
從亦黑迷失身份看馬可波羅 ——《一百大寺看經記》碑背景解讀	陳得芝(39)
耶律楚材傳世詩卷《贈劉滿詩》讀後	劉 曉(59)
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諭》與皇太子的立廢及玄燁的內心世界	姚念慈(81)
略論杜甫與天寶十五年之“制置”事件	許德楠(167)
20 世紀中國古代簡帛、銘刻、文書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趙 超(191)
悼念張芝聯教授	夏自強(281)
學貫中西的鴻儒洪業先生	丁磐石(291)
勤奮、創新、愛國 ——紀念先父齊思和先生百年誕辰	齊文穎(313)

Contents

From Pluralism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re	Hsu Cho-yun(1)
From Tū-yún to Heicheng (EdzìNa) :A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Exploitation of West China	Xu Pingfang(15)
A Study of the Career of Yi-Hei-Mi-Shi in Comparison with Marco Polo	Chen Dezhi(39)
Notes on the Poem for Liu Man Written by Yelü-Chucaï	Liu Xiao(59)
Comments on “The Most Fair and Frank Belongs to Our Dynasty Since Ancient Times”	Yao Nianci(81)
On Du Fu and the Event of “Zhizhi” in the Tianbao 15 th Year, Tang Dynasty	Xu Denan(16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Slips, Silk Books, Inscrip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in The 20 th Century	Zhao Chao(191)
In Mourning for Prof. Zhang Zhilian	Xia Ziqiang(281)
Prof. Hong Ye, an Erudite Well Vers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Ding Panshi(291)
A Diligent, Innovative and Patriotic Scholar: in Honor of My Late Father QI Sihe’s 100 th Birthday	Qi Wenying(313)

從多元出現核心*

許倬雲

(壹) 正文

一 引言

自從先秦以至隋唐，中國長期以“中原”為文化與政治的中心地區，這一情形，在南方逐漸興起後，始有改變。類似情形，也可見之於歐洲歷史，地中海北岸，自古希臘以至中古，長期為歐洲的文化中心，這一地區也可稱為歐洲的“中原”。印度的“中原”先後是印度河與恒河流域；中東地區的“中原”，也先後在兩河地區及波斯灣上（今日的伊朗）。這一“中原”，是怎樣形成的？本文即擬由中國歷史上“中原”的形成，追溯到考古的時代，以觀其發展過程。

近來考古學發現了這個過去未為人知的古代文化，這些人類早期的文化，有其燦爛的文物，令人驚艷；這些古代人類群體，能夠掌握高度艱難的工藝，能夠動員大量的人力，無不反映他們的社會已有複雜組織。其實已是相當有規模的群體了。這些考古發現有組織群體，分散於今日中國疆域的各處，有的在後世中原之內，有的遠在後世的邊陲。茲擇其尤足注意的幾處古代文化，作為本文討論的主題。為了對考古學不很熟悉的聽眾，我先解釋幾個考古學的詞彙。

考古學上的“文化”，意指人類生活各個方面，包括衣食住行、組織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等等，呈綜合的整體相。某一文化的命名，通常借用遺址所在的

* 本文是許倬雲教授2007年11月2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上所作的講演。第一部分為正文，第二部分是回答聽眾提問時的討論。

小地名。

由於史前人類沒有文字記錄，我們必須從留存的遺物與遺址，由物見人，推測出古人的文化面貌。例如海漁用具與農具比例，推知他們如何取得維生資源；又如，從遺址內不同房屋的大小差異，建築方法，居住空間的安排，不同房屋的相互關係，可以推測這個聚落的社會結構。

中國的考古學，特別注重器物形態的分類（形態學），也注意文化層次的認知與不同層次之間的相對關係（地層學）。由形態學，考古學家能從陶器、銅器等遺物認出一個文化的特徵。從地層學，可以建構不同文化層的前後關係，甚至可以因此建構較長時段的年代與文化落差。

考古學家還可以從遺址土壤中的動物骨骸、植物種籽與花粉，分析當時的環境生態。

表一 五帝時代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繫年表

年 代	地 區 文 化	古史傳說	中原地區 華族集團	東南沿海處(夷) 夏集團和苗蠻集團			燕山地區黃帝集團	
				山東	環太湖	江漢地區	遼 西	內蒙古中南部
距今 6000 -		神農氏時代	仰韶前期	大汶口早期	馬家浜	大溪文化	紅山早期	仰韶前期
5500 -		五帝時代前期	仰韶後期	大汶口中期	崧澤文化	屈家嶺文化	紅山晚期	海生不浪文化
5000 -		五帝時代後期	龍山文化(早中期)	大汶口晚期	良渚早期	石家河文化	後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龍山文化
4500 -				山東龍山文化	良渚晚期			

表二 大汶口文化發展序列的層位關係示意圖

龙山					上文化層
晚期			晚期墓 M10	上層墓	中文化層
中期			中期墓 M9	下層墓	下文化層
			早期墓 M23M26		
		晚期墓 M16			
早期	晚期墓 M72	早期墓 M30			
	早期墓 M102	下文化層			
	刘 林	大 墩 子	大 汶 口	西 夏 侯	东 海 峪

* 表中墓號、箭頭表示墓葬間疊壓打破關係

二 東北紅山文化

公元三千多年前，東北地區的遼河、大凌河流域，曾有過紅山文化，以遼寧凌源的牛河梁遺址為例，這一個遺址群，有多層石塊堆積的積石塚及其附屬的壇臺，有稱為“女神廟”的祭祀遺址，有號為“金字塔”的土石結構。這些不同功能的禮儀性遺址，分布在一片相接連的山地，當有一定的相關性，合而立之，可能形成一個禮儀活動的中心。積石塚出土的文物，有紅山文化最為著稱的玉石刻件，如“豬龍”（或“熊龍”）、雲紋玉件、飛鳥、玉璧、玉玦……無不雕工精緻。積石塚及其相關的壇臺，由不同石料接連，有些石料採自當地，有些則來自具有相當距離的遠方。積石結構中，還有大量空底陶罐，排列於周邊，其功能不詳。“女神廟”的遺址，出土陶塑的大小女神軀體殘片，其中包括相當巨大的手掌，若復原其全軀，可能為常人的三四倍之巨；一具女神面部，則大如常人，有紅石鑲嵌為眼珠——凡此遺址規模及文物品質，反映建造這麼一個紅山文化的禮儀中心，必須有相當人力及資源，始能臻至！紅山文化的其他遺址，分布地區頗為廣袤，涵蓋遼河流域，遠及內蒙古東部及燕山

地區。如果這是一個政治群體，則其疆域定然不小！

但是紅山文化之後是夏家店下層文化（2000 ~ 1500B. C. ），分布地區更廣，遠及今內蒙古、河北張家口，以及渤海平原的相當部分。只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文化特徵迥異於紅山文化。那些精美的玉石刻件及複雜的禮儀性遺址，均不見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紅山文化似乎戛然而止，並未繼長增高，更遑論由此而發展為可以長期延續的文化中心區。

三 山東龍山文化

在山東半島，考古學上的大汶口文化（4100 ~ 2600B. C. ）及龍山文化（2600 ~ 1500B. C. ）都有可觀之處。大汶口文化之最堪注意之處，在其陶罐上出現的刻紋，可能是文字。同一個形體的“字”出現在各處，相距數百里之遙，這就不是一般的刻紋，而是約定俗成的符號了！大汶口文化分布甚廣，發現的遺址有六百多處，遍及山東全省，南至蘇北，西至豫東皖北，歷經 1500 年之久，誠堪稱為中國東部一個十分發達的古代文化。

大汶口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有地層疊壓的現象，其前後繼承的關係，相當清楚。山東龍山文化的城子崖遺址，是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創所之初發掘的。當時出土的蛋殼黑陶，黑色光亮，其薄透光。根據這一黑陶傳統，傅孟真先生遂發為著名的夷夏東西之說！山東龍山文化的朱封墓地遺址，有三座大墓，規模宏大，結構複雜，隨葬文物包括精細陶器、玉飾、骨匕、獐牙、豬下頷骨及鱷魚皮件、鱷魚骨板等物件。蛋殼陶製的高腳杯，則放置在彩繪的邊箱內，顯然是特別珍貴的禮儀器。

泗水尹家城遺址，發現山東龍山文化墓葬 65 座，按照其葬品的多寡與精粗及墓穴的規格大小，可以分為三等七級。第一級最大的大墓，墓穴 25 平方公尺，且有兩棺一槨。除二次葬的主人骨骸，還有人頭骨兩個，後者當係殉葬者。隨葬物品眾多，包括白陶罐，蛋殼陶高腳杯，大量豬下頷骨，鱷魚皮骨板，可能是獸鼓殘件。次一等的四座大墓，各有 10 平方公尺，隨葬品豐富，但是沒有人頭骨，也沒有獸鼓。第二等 29 座墓葬分三級，均為中等墓，隨葬品不多，其中最小的七座墓穴中，均無隨葬品，但個別死者手持獐牙。第三等小型墓共 21 座，大小僅能容屍，隨葬品只有簡單的陶器，甚至全無隨葬品。

這一墓葬群的等級分明，反映其社會也是有貴賤貧富的階層分化。

山東龍山文化的活力非凡，至今發現的遺址已逾千處。不少是大型村落，還有城址數十處。這一文化分布地區廣闊，人口衆多，文化鼎盛，如果有部落組織，應是中國東部的重要勢力。這一文化系統之後，接下去是岳石文化（2000～1500B. C.），直接疊壓在山東龍山文化地層上面。岳石文化遺址的分布也遍及山東半島，但是只有二三百處，而且村落不大，似乎人口不多。岳石文化的文物，品質不能與龍山文化相比。顯然，岳石文化時期的山東地區，文化衰落，勢力大不如前。倒是在中原已有強大興盛的商文化時，帶有岳石文化色彩的山東土著文化，還存在於山東半島的邊緣，例如膠東地區及南邊沿海一帶。從大汶口文化，到山東龍山文化，山東地區很有可能有一個能夠持久發展的文化中心區，岳石文化接替了龍山，不知何故，卻不再能繼續其文化鼎盛的傳統。

四 蘇浙良渚文化

在江蘇與浙江，良渚文化有其燦爛的成就，這一文化的時代相當於東北的紅山文化。在杭州良渚附近，數十平方公里的地區，有密集分布的許多文化遺址，人工堆砌的土山，高達數十尺，是良渚文化獨特的遺址。有的土山頂上有規格嚴整的壇臺，甚至有五色土壤按四方與中央的部位鋪敷，也有的土山是排列整齊的墓葬群，至少有一處遺址是面積頗大的建築基址，一片平臺，填築於不同的地形之上，臺基上面有成列的柱洞柱基及燎火的火坑。這一大型基址，應是一個相當巨大的禮儀性建築物地基。

良渚文化的玉石琮與璧，是其最具特色的文物。即使良渚文化消失之後，琮與璧也還傳布四方，成為中國玉石文化中常見的形制。良渚文化玉件上，常有精細的雕紋，其中有一件神面圖案，大小不過常人拇指指甲，卻可刻到細節，竟可媲美後世的微雕工藝。良渚文化的時代，還未有金屬工具，他們如何切割玉石，如何鑿為空心的玉琮，而且還有石柱留下？凡此工藝，至今我們還是得不到滿意的解答，更遑論如法炮製了。

良渚文化的遺址，分布遍及蘇南與浙江，往北及蘇北與山東的南邊。這是一個活力強勁的文化，以其製作工藝品與建築禮儀中心所需的人力與物力言，

如果没有相當複雜的龐大群體，恐也難成厥功！這一文化的上層，卻是不很出色的馬橋文化。幾乎所有良渚文化的特色，均已消失，只剩下一些江南的土墩墓及隨葬的原始帶釉陶器。

五 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原地區的南面，西起巴山、東至淮河的地域，大部分是由漢水和長江沖積而成。在這個湖河縱橫的丘陵地帶，土地肥沃，氣候適宜，人們普遍從事稻作農業。他們的生活，截然不同於中原地區黃土地上以粟作農業為主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繼屈家嶺文化之後分布於湖北地區。在漢水流域，人們發現了大面積的聚落遺址（120 萬平方米）和墓地，其精美的玉器雕刻呈現出相當複雜的文化面貌。然而，與此同時，來自於中原地區的文化開始介入。從漢水—長江流域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存即可見一斑。商人在湖北盤龍城建了一個軍事重鎮，其影響已深入到長江北岸。但是，商的影響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了晚商時期，漢水—長江地區已不再是商的勢力範圍。周人擴張以後，沿着淮漢流域北界建立了許多諸侯國。此時，蠻、婁和其他來自四川的土著民族都進入了有着富饒土地的漢水—長江流域。昭王向南擴張的失敗，使這些土著有可能向南擴張。楚國的興起，可能是夔族首領統一各個土著部族的結果。夔族，據說是發源於北方，後從河南東部遷徙而來。在春秋時期，強大的楚國是晉國中原霸權最主要的競爭者，幾乎控制了周在淮漢流域所有的諸侯國。

六 “核心”的文化傳承

紅山、大汶口/山東龍山及良渚文化，都有其驚人的成就，顯示了這些人群的創造力與組織能力。然而，這些文化都後繼無人，都由一些成就不足道的文化代替了。誰是那些接續文化的人群？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確定他們與其所接續者的人群是否同一族群。如果前後文化的族群相同，則後起者數典忘祖，是不能繼承祖先文化的不肖子孫！如果前後文化的族群不同，則後來的新人不知吸納當地遺產，也是可惜。

相對而言，古代黃河流域的情形，卻是另一番景象。仰韶文化有兩個同時平行發展的文化，一個是半坡文化，一個是廟底溝文化，都從陝西中部至東部間形成。半坡文化遺物，漁獵用的器物，佔了不少的比例；廟底溝文化的遺物，則以農耕用具比例為大。這一差異，說明二者維生方法，各有其選擇。二者常在鄰近分別出現，總的分布地區，廟底溝文化的範圍較大。從陶器花紋上，可找到這兩個文化的標誌：半坡文化的彩陶花紋，常見魚形，而廟底溝文化的花紋，則常見鳥形。當然，認明這兩個文化的線索，不僅於此；只是魚鳥之分，相當易於分別，也比較有趣。

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文化（4000 ~ 3300B. C.）由關中東向發展與山東的青蓮崗文化互相影響，廟底溝二期文化（3000 ~ 2000B. C.）與大汶口文化互相影響，到達了中原的廟底溝文化也與南方長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嶺文化系列互相影響。處於四戰之地，壓在仰韶文化上面的中原龍山文化取精用宏，遂有強勁的活力，不但在河南繼續發展，還能延伸到河北、山東，與當地土著文化一較長短。

（1）陶寺文化

陶寺墓地有數百座墓群，大墓占全數百分之三，中墓為百分之十一，小墓為百分之八十五，顯示極度的貴賤等級。大墓之中，最大的一墓，隨葬品十分豐富，包括大型的陶罐、鱷魚皮製的獸鼓、石磬、大型陶祖、彩繪龍盤……儼然王者氣象。最近在墓葬群遺址南邊，又發現了一座面積頗大的城址，有城牆道路，其規模儼然都城。在大城的南牆外，發現一座小城，似為禮儀中心，其中有兩圈夯土柱遺存，柱間留有對應的縫隙。發掘的考古學者，認為是用於觀測兩分兩至日光照射的設施。遺憾的是並沒有發掘出有立體形象的土柱實體，有天文史研究者提出了質疑，尚待進一步證實。

（2）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中國的考古學家以為即是夏代的都邑。二里頭遺址已出土格局規整的大型殿堂基址，最近又發現道路與院落，附近並有陶窯及大量綠松石切片。二里頭也顯然是位階較高的都城。陶寺與二里頭，都在中國考古家認定的夏文化區內。我不以為夏代與商周是一樣的王朝。夏人稱其統治者為“夏后”，不稱夏“王”，可能因為夏集團是一個眾多部落的聯盟，夏禹是以盟主

的身份召集“萬國”來會。夏文化區內，可以有不同的地方性群體，其文化也無妨有些差異。二里頭文化與東下馮文化，即各有其特色，並不完全相同。

據蘇秉琦先生意見，陶寺文化接受了仰韶、紅山，甚至良渚各處的影響，所謂“華山玫瑰紅山龍”！而且在唐叔受封於晉時，晉地還有“戎索”與“夏制”兩種習慣法，加上“周制”則是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晉獻公文公父子兩代與當地土著聯姻，晉卿大夫中，不少異姓，甚至有出身戎狄者，凡此無不顯示夏文化的人群頗為多元，也頗能容納接受異種文化。

商人繼夏而興。天命玄鳥，降而為商；商人的神鳥祖先傳說，甚與東北民族（滿洲，高句麗）相似。先商文化與早商文化，頗多在渤海沖積平原的遺址，其西邊極遠，還可到達張家口一帶。鄭州商城遺址，也確比偃師商城遺址為早。因此，正如傅孟真先生數十年前所主張，夏商的相對位置是夏在西，商在東，二者各有其族裔及文化淵源。商湯征夏，頗費了一番氣力。據李伯謙先生意見，偃師商城近二里頭夏文化遺址，可能是直逼敵營的戰略。

七 商周時代

商人建國，其國家組織與制度日益完備。從殷墟卜辭重建的制度演化看，晚商二百年的變化，已頗可觀。商代毋寧是逐步走向“國家”的時代！商人繼承了夏人的領土，可能也接納了不少夏人的文化。

商人祭祀，除了先公先王先妣之外，頗多“雜祀”，其中可能即將異族異文化的神祇或文化英雄，轉化為自己奉祀的神明。我以為，後世禮經中的五帝，炎黃在今的河北，太昊、少昊與顓頊都在豫魯之間，均為商人早期立足的中原東偏地區。商室先人之中，王亥王矣諸人，也都在東方地區活動。蚩尤、共工、后羿，兩套水神與農神，不是正統譜系的古代人物；他們都沒有編組為古聖先賢的神話與傳說系統之中。如果這樣的推測成立，則商人是接納多元異文化的族群，選擇他族成分，取精用宏，遂能成就“大邦商”的地位，其居地遂能成為核心，號稱“中原”。

西周繼起，來自西垂。今日周原考古所見，不僅周人以其卑弱事奉大邑商，周人甚至還奉祀商室先王，猶如自己的神明。周人由弱小的西邑，長期事奉商國，在取得天下後，修建雒邑，居天下之中。西周一代，始終是東西兩

京，以成周控制東土諸侯。西周覆滅，平王東遷，依附晉、鄭，“中原”的重心在伊洛之間。晉人累世稱伯，儼然中原共主，一個兼具夏、商、周三代文化，而又是三代數地重疊的地區，於是成為具體的“中原”。我以為夏之列入商周，成為古人稱頌的“三代”，正是因為商承襲夏，周承襲商，周人又舉夏人歷史以自重身價，以當世投射於過去，遂完成連續相繼的“三代”。

八 結 語

“三代”的觀念，實與“中原”不可分割。這一正統的成立，可謂三個文化的族群都能採擷別人的文化，江河不擇細流，始能成其大。三個族群前後相承，而又接收前人文化遺產，所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不自閉，不固拒，更不排斥，還能繼長增高。古人經歷，可為今人鏡鑑。古史指陳，紅山、大汶口、良渚、石家河均有傲人的文化，但不能前後繼承，終於漸滅。夏商周三代，如接力賽跑，不棄前人文化遺產，終於成為中國文化正統之起點。我們今日，正在心胸開放與關閉之間，須有明智抉擇，方能有成。

(貳) 討 論

從以上陳述，似乎公元前二千年是一個轉變的年代，中國地區的幾個重要文化區，都出現了相當顯著的變化，除了從關中到豫東、晉南一區外，其北方、東方、東南方，曾有過輝煌成績的文化系統，都呈顯著的衰象。然則，其故安在？

環顧世界別處的古代文明，我們竟也可以見到巨大的變化。兩河文明，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紀的後段，其西北方今日土耳其，有西台（Hittites）崛起，強烈威脅了兩河的古文明。一時之間，赫提、米底……等國，興起於兩河“中原”的旁邊。埃及地區，有希克索斯人的馬駕戰車入侵。前此，埃及人從未見過馬匹，面對如此巨大的動物，快速衝突，埃及的步兵手足無措，全無鬥志。在愛琴海上，原本在巴爾幹半島的部落，一批一批南侵希臘半島，希臘出現了許多古代城邦。中亞地區則有一波又一波的印歐民族族群向南移徙。前後將近一千年，印歐族群已散布於南亞印度次大陸，與當地土著融合為新的族

群。印度河流域的哈拉本文化，爲之消失，由古代的吠陀文化代替。這些新來的族群，有的組織了城邦，有的組織了小型王國。

上述四五條由北衝向南方的族群移徙，以其語言特徵及社會組織來看，似乎都是源自高加索山下的印歐民族。然則，究竟什麼因素，將這些族群推向南方，並且後浪推前浪，持續了南移的動力，幾乎有一個千年紀之久？

大規模族群持久的移動，往往與長期氣候的變化有關。竺可楨首先考察中國五千年的氣候變化，不過其依據的資訊，以文獻中的物候紀錄爲主，對於缺少文獻的史前時代，則依據格林蘭冰層的層次判斷，是以史前部分的精準度，則不如歷史時代。幸而，近來中國考古田野工作，頗爲注意植物種籽遺存，由此得以推知當時的氣候。王明珂與林滄，根據許多田野數據，都指出距今四千年前，中國北方有過持續頗久的乾寒氣候，對於中國高緯度地區的生態，曾有嚴重影響，因此改變了當時人類的維生方式。

我們曾提出的紅山文化的上層，銜接了夏家店下層文化，這一文化層的遺存，出現了較多的動物骨骸，尤其牛羊骨頭，多數豬骨，似乎顯示其生活方式，畜牧的比重已不小。夏家店下層，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箭鏃與武器。同時，在遼河流域至今的內蒙古東邊，出現成串的城堡及城牆，似是防衛之用。凡此資料，可以解釋爲當時北方已不宜農業。而其生活方式轉向移動性較強的畜牧，甚至正在轉向游牧化，這種生活方式，爲了爭奪地盤，也爲了保護族群及牲口，不得不依恃武力，也不免有相當距離的移徙。

在今日溝家西部河層，向西延伸到陝北與晉北，距今四千年紀的朱開溝文化遺址，在乾寒氣候的高緯度地區，新石器文化正在轉向青銅文化，出土了許多稱爲鄂爾多斯文化的器物，顯示與內亞與中亞的文化有相當的關聯，而且也有武化的特徵，多佩干戈刀矛之屬。

夏家店下層與朱開溝兩個文化系統，一東一西，分別呈現中國高緯度地區的生態變化。北方生計困難，必然會有族群南移的可能。在今日河北遼西地區的夏家店文化族群，可能即形成對於今日河北與山東地區的壓力。炎黃的傳說，也許反映農業部落與“以師兵爲行衛”的武裝部落之間鬥爭的記憶。

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曾經有相當衆多的人口與聚落。在距今四千年前，山東新石器文化的遺址數量減少，而在豫東、魯西南，皖北及蘇北，卻又

見到山東文化的擴張。這一山東文化的擴張趨勢，在淮漢地域，與當地文化接觸，毋寧為後世楚文化的出現，有相當的催生作用。到了距今三千多至二千五百年間，楚文化崛起儼然是中原華夏文化團的強大對手。

由山東文化團南向，則是江浙沿海文化團。良渚文化的勢力，曾經北延進入山東南部。這兩大文化團，在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之間，融合為東周時代的吳越文化，其青瓷與冶金技術，都有高度水平。其後吳越文化，首先挑戰中原華夏與江河荆楚兩大文明系統的霸權。後世秦漢兩期，都花了不少力氣，將這一地區納入帝國版圖。

遼河流域、山東半島及長江三角洲兩側的三個頗為可觀的古代文明，在距今四千年北方族群的壓力下，都有變化，而與別處文化，融合為新的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過程中，各有其階段性的意義。

至於前面所說的諸夏文化，其廟底溝二期的仰韶文化，在東向延伸的過程中，已與河南、山西的當地文化融合。這一地處黃河流域的“諸夏”，不像紅山、大汶口—龍山及良渚文化，並沒有十分令人驚詫的精美遺物，也不見大型禮儀性建築（如積石塚、土壇……），毋寧呈現了較為平實的文化色彩。於是，這一文化系統也似乎沒有從高峰跌落谷底的顯著變化。然而，高緯度地區生態變化引發的連鎖反應，也會有對於“諸夏”文化的衝擊。商文化的老家，一般都認為是在渤海沖積平原，南向取代了“諸夏”、也與“諸夏”融合。本來在陝西的姬姜集團“小邦周”，東向取“大邑商”而代替。周人封建，原是軍事屯戍的組織，卻也是周、商與各處土著文化族群融合的機制。另一波西北族群壓力壓垮了宗周。東周擾攘，則是中原各文化的融合及與荆楚吳越的融合過程。

綜合上面諸節，我以為距今四千年前的長期乾寒氣候，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移動及文化轉移的北與南，由西往東，東亞這一大片土地上，幾乎二千年間，人類族群不斷重組，不同文化不斷融合，遂有“中國”觀念的不斷改變，及其內涵意義的不斷擴大，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複雜。

這一古代氣候改變的長程影響，在歐洲是一波一波族群，一次又一次的建構了新的族群，終於逐漸以“民族國家”的面貌，各自尋求主權獨立，又在共處並存之時，建構了列國體制。武裝族群，在不斷移徙與戰鬥中，必須推選